

馬 克 思

資 本 論

政治經濟學批判

第 一 卷

資本的生產過程

郭大力、王亞南譯

一九六五年·北京

馬克思

資本論

德意志社會主義民主黨

第一卷

馬克思恩格斯著

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1955年出版

本书此次再版，曾由译者根据德文原本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3卷及英文译本对译文作了一次校订，译文不妥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1963年9月

馬 克 思
資 本 論

第 一 卷

郭大力 王亚南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8 $\frac{3}{4}$ · 插页 6 · 字数 627,000

1953年3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2版

1965年1月北京第11次印刷

印数 207,501—257,500 定价（四）2.70元

统一书号 1001·116

初版的序

现在我把这个著作的第一卷提交給讀者。这个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的續篇。初篇和續篇之間的长久間隔，則是由于一次多年的疾病，再三中断我的工作的原故。

前书的内容，已經概述在这一卷第一章內。这不仅为了求得联貫和完备。叙述也改进了。在情况許可的限度內，許多前书只略略提到的論点，本书是論述得更为詳細了；反之，已在前书詳細論述的一些論点，在本书就只略略提到了。論述价值学說和货币学說历史的部分，現在自然完全刪掉了。但是，前书的讀者仍然会在本书第一章的注解內，关于那各种学說的历史，发现一些新的資料。

一切事的开头总是困难的。这句话，在任何一种科学上都是适用的。所以，第一章特別是包含商品分析的那一节，是最难理解的。关于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經尽可能做到通俗易解了¹。以货币形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是极无内容，极简单的。

1 因为連拉薩尔在他著作中反駁苏尔茲·德利希的章节內（虽然他自称已經把我关于这些問題的說明的“神髓”提示出来），都包含着严重的誤解，所以好像更加有这样做必要。附帶要說到，拉薩尔經濟著作中全部一般性的理論命題，例如关于資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联系等等，几乎逐字从我的著作剽窃，連我創造的名詞在內，但未注明出处。他这种行徑也許无非为了想鼓吹一下。当然，我这里說的，不是他关于某些細節的解釋和应用，这些是和我沒有关系的。

但是二千余年以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还是毫无结果；同时，对一些内容丰富得多并且复杂得多的形态的分析，却至少已近于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的。并且，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但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态或商品的价值形态，就是经济的细胞形态。在浅薄的人看来，这种形态的分析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细的事情。它所考究的，诚然是一些琐细的事情，不过和显微镜下的解剖，是做的一样的琐细的事情。

所以，除了论价值形态的那一节，人们不能非难本书，说它难于理解。当然，我原假定，读者是一个愿意学一点新的东西的人，所以他会自己动一动脑筋。

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就是要在它表现得最为精密准确并且最少受扰乱影响的地方进行考察；或是在可能的时候，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纯粹进行的地方进行实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直到现在，它的典型所在是英国。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所以我在理论的阐述上，总是用英国作为主要的例解。但若德国方面的读者对于英国工农劳动者的状况，伪善地耸一耸眉头，或乐观地，用德国情形远不是如此恶劣的话来安慰自己，我就必须大声告诉他说：“这正是说的閣下的事情！”

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引起社会的对抗。这种对抗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更高或者更低，就它本身来说，并不是我们这里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这各种规律本身，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工业比较发展的国家，不过为那些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Karl Marx.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Das Recht der Uebersetzung wird vorbehalten.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67.

New-York: L. W. Schmidt. 24 Barclay-Street.

《資本論》第一卷德文初版封面

(縮 印)

比較更不发展的国家，显示出它們自己未来的形象。

且不說这一点。在資本主义生产已經在我們中間完全安家落戶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內，因为沒有工厂法的对抗力，情形就比在英国恶劣得多。在一切其他範圍內，我們都像西欧大陆其他各国一样，不仅有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苦着我們，而且有資本主义生产发展不够的情形苦着我們。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們。这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生产方式的殘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不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引起。我們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捉住生者。

德国及西欧大陆其他各国的社会統計，和英国的社会統計比較起来是很貧乏的。但是这种社会統計依然充分揭开了黑幕，讓我們窺見幕內麦杜莎的头。假若我們的政府和国会，像在英国一样，定期派遣委員去調查經濟状况，假若这种委員又像在英国一样，被授予全权去揭露事实真相，又若可能找到像英国工厂視察員，公共卫生报告医师，女工童工剝削状态居住状态和营养状态等等的調查委員那样精干，无私，而坚决果敢的人去充任这种职务，我們將會在我們自己的状态面前愕然大吃一惊罢。波西亚斯戴起一頂隱身的帽子，以便追尋巨魔。我們却把隱身的帽子紧紧遮着耳目，以便否认巨魔的存在。

我們決不要在这上面欺蒙自己。像 18 世紀美国的独立战争，为欧洲中等階級鳴起了警钟一样，19 世紀美国的南北战争，又为欧洲工人階級鳴起了警钟。在英国，革命过程是可以明白看到的。这个过程达到相当程度之后，一定会在大陆方面发生反应。在那里，这个过程將會在比較殘忍的形式上进行，还是在比較温和的形

式上进行，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即使没有更为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切身的利益打算，将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阻碍着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在许多理由中，这也是我在这一卷用这样大一个篇幅来细述英国工厂法历史，内容与结果的一个理由。一个民族，应该并且能够向其他的民族学习。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发现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把生育的痛苦缩短并且减轻。

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要附带说明一下。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来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这里考察的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比任何别的观点，都更不能要任何个人对这各种关系负责。

自由的科学研究，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不只会遇到在其他一切范围内将会遇到的相同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例如，英国的高教会，会饶恕那种在三十九个信条中对三十八条进行攻击的行为，而不会饶恕那种攻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行为。在今日，与旧财产关系的批判比较，无神论已经是一种轻罪。但是这里，进步依然是不容置疑的。例如，我可以引证数星期前发表的一种蓝皮书，《女王驻外使节关于产业问题和工会的通信》。在那里，英王的驻外代表，就用

直率的文句，力說勞資現有关系的变革，在德国，在法国，总之，在欧洲大陆一切文明国家，是和在英国一样明显，并且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大会中宣称，奴隶制度废除之后，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跟着出现到日程中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紫袍黑衫遮盖得住的。这些事实，没有包含奇迹将会在明日发生的意思。它们不过表明了，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透露出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感觉到现在的社会不是什么固定的結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不断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本书第二卷将討論資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終卷（第四册）将討論學說史。

每一种科学批評性的意見，都是我所欢迎的。至于那种不过拿所謂社会輿論作幌子而我从来不对它让步的偏見，那末，佛洛倫偉大詩人的格言，现在还和以前一样对我是适用的。

“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說罢！”

卡尔·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倫敦

第二版的跋

我首先要向第一版的讀者，关于第二版所作的修改，提出一种报告。一望而知，书的篇別是更为显目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注明是第二版注。就本文說，最重要的，有下述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关于价值的論述，是通过每一个交换价值所借以表現的方程式的分析而进行的。这种关于价值的論述，已經科学地更加严密地完成了；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决定的价值量間的联系，在第一版不过略微提到，在这里，也显然更为突出了。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态）已經完全改写。这是第一版的二重叙述規定要这样做的。——让我附帶說一声，那种二重叙述，是由于友人汉諾威的庫格曼医师的劝告。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訪問他。他劝我說，关于价值形态，大多数讀者需要有一种补充的更合讲义性质的解說。——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大部分改写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經過了仔細的訂正，因为第一版考虑到《政治經济学批判》（柏林1859年）已有的說明，这一节的論述是不够細緻的。第七章，尤其是当中的第二节，也大大地改作了。

当然，把各处原文的改正一一列举出来，是沒有用处的。这种改正往往只是文体上的改正。这是全书都有的。我現在正在校正将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譯本。在校正时，我发觉，德文原本有某些部

分必須有更为彻底的改作，还有別一些部分必須有更大的文体上的改正，甚至要細心除掉一些偶然的錯誤。但時間不允許我这样做，因为 1871 年秋，我正忙于进行別一些迫切的工作时，才接到通知說，书要完了，第二版的印刷已經应当在 1872 年一月开始。

《資本論》迅速在德国工人階級广大範圍內得到的理解，对我的劳动來說，是一种最好的报酬。在經濟問題上代表資產階級观点的梅耶先生，維也納的工厂家，也在一本在德法战争期中发表的小册子上适当地证明，被視為德国世襲财产的卓越的理論工作才能，已經在德国所謂有学識的階級中間完全消失，但却在德国工人階級中間重新活跃了起来。

直到現在，政治经济学在德国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古斯塔夫·方·居利希在他所著《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特别是在 1830 年出版的該书前二册中，已經大概說明了，历史上有些什么事情，在我們这里阻碍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从而也阻碍着近代資產階級社会的建立。所以，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生活地盘依然沒有。这种科学依然是当作完成品，从英法二国輸入；德国的經濟学教授們还是小学生。因此，外国现实的理論表現，在他們手中，就变成了各种教条的一个集成，被他們用他們周圍的小資產階級世界的观念去解釋，所以被他們曲解了。可是，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並沒有完全压制下去。他們还不安地觉察了，他們必須在一个实际上自己并不熟习的範圍內钻研。对此，他們只好企图用博通文献的美装，或用陌生材料的凑集来做掩飾。这种材料是由所謂官府科学——一种拉里拉杂的知識混合物，德国官僚满怀希望的候补人所必須通过的一个炼獄——抄襲来的。

1848 年以来，資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发展了，并且現在正

是資本主義欺詐繁花盛開的時期。但是我們的專門家的命運還是不佳。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近代經濟關係在德國的現實中還是缺少的。而在這種關係已經生出的時候，卻又出現了一些事情，使他們在資產階級視野之內，不允許再有公正無私的研究了。政治經濟學，在它還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不把資本主義秩序視為是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把它視為是社會生產的絕對的和最後的形式時候，本來只有在階級鬥爭仍然潛伏進行，或不過在個別孤立現象上表露的時候，能夠還是科學。

拿英國來說罷。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就是屬於階級鬥爭尚未發展的時期。它的最後的偉大代表里嘉圖，終於有意識地把階級利害關係的对立，工資與利潤的对立，利潤與地租的对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对立當作社會的自然規律來理解。但是，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由此也就達到了它的不能跨過的限界了。因此，還在里嘉圖活着的時候，它就已經從里嘉圖反對的方面，受到了西斯蒙第這樣一個人的批判¹。

繼起的時期，從1820年到1830年，在英國，有政治經濟學範圍內蓬蓬勃勃的科學活動作為特徵。這是里嘉圖學說庸俗化與普及化的時期，同時也是里嘉圖學說與舊派進行鬥爭的時期。這是一場好看煞人的比賽。但因爭論主要分散在雜誌的論文上，論述時事問題的著作上，小冊子上，所以當時的情況，在歐洲大陸方面，是不大被人知道的。這一次論戰的公正無私的性質——雖然里嘉圖學說已經例外地被用來作為攻擊資產階級經濟的武器——可以由當時的情況來說明。一方面，大工業還剛剛脫離它的幼稚

1 參看我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第39頁。

КАПИТАЛЪ.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ІИ.

СОЧИНЕНІЕ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

ТОМЪ ПЕРВЫЙ.

КНИГА I. ПРОЦЕСС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

С.-ПЕТЕРБУРГЪ.

ИЗДАНИЕ Н. П. ПОЛЯКОВА.

1872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个俄文版封面  
(縮 印)

时期。这一点，由大工业还刚刚用 1825 年的危机来开始它的近代生活的周期循环这件事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间的阶级斗争，也在下述两种斗争面前，被迫留在幕后：政治方面是，集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各国政府和封建贵族正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群众发生决裂；经济方面是，产业资本正和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法国，是隐蔽在小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的后面，在英国，自有谷物条例以来则是公开爆发了。英国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叫我們想起魁奈医生死后法国经济学狂飈压进的时期，但不过像晚秋晴日叫人想起春天。1830 年，决定性的危机就发生了。

法英二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夺得了政权。从此以往，无论从实际方面说，还是从理论方面说，阶级斗争都愈益采取公开的和威胁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敲起来了。现在，问题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而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为私利的研究没有了，作为代替的是领取津贴的论难攻击；公正无私的科学的研究没有了，作为代替的是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以工厂主科布登和布赖特为首的反谷物条例同盟强蛮倾销到世界上来的小册子，因为对地主贵族提出了争论，所以虽然没有科学的意义，但毕竟还有历史的意义。但是这个最后的一根刺，自从庇尔爵士执政以来，也由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去了。

1848 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发生了反应。不愿单为统治阶级辩护，单向统治阶级献媚，还要求一点科学意义的人们，企图调和一下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现在已经不容无视的无产阶级要求。因此，一种没有生气的折衷主义发生了。约翰·穆勒是其中最著

名的代表。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宣告。关于此事，俄国的偉大学者和批評家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他所著《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綱要》中，已經精彩地加以說明了。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它的对抗性质已經在法英二国由历史斗争而成为众目昭彰以后，方才在德国趋于成熟。同时，德国的无产阶级却比德国的资产阶级在理論上已經有了明确得多的阶级意識。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好像可能在德国成立了，但因此又成了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的发言人分成了两个集团。一方面是伶俐的，唯利是图的，只顾实际的人。他們集合在庸俗经济学辯护論者中最淺薄从而也最成功的代表巴斯夏旗帜下。另一方面是以经济学教授資望自負的人。他們追隨在約翰·穆勒之后，企图調和那种不能調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时期，固然只是小学生，盲从者，应声虫，只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子；在它的沒落时期，也是这样。

德国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发展，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不能有任何独创的成就，但它的批判不是这样。这种批判在它毕竟是代表一个阶级时，只能代表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那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发言人，包括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当初企图用不理不睬的办法来把《資本論》抹杀。他們对于我以前各种著作曾經成功地应用过这个法子。看到这种战术已經不再适合时势，他們才以批評我的著作为名，想写下一个单方，来“鎮靜一下资产阶级的意識”。但在工人报纸——例如狄慈根在《人民国家》发表的論文——上，他們发现了比他們强而有力的战士。对于这些

战士，他們直到現在还是理屈辞穷，无以作答的<sup>2</sup>。

《資本論》一个优秀的俄文譯本，1872年春出版于彼得堡。初版3,000册現在差不多已經銷完了。1871年基輔大学政治經濟学教授西伯尔先生在他所著《里嘉图的价值学說和資本学說》中，已經证明我的关于价值，貨幣和資本的学說，在基本特征上是斯密—里嘉图学說的必然繼續。而使西欧人在閱讀这个結实的著作时感到惊異的，也正是純理論立場的一貫坚持。

《資本論》中应用的方法，不大为人所理解。这一点，从人們关于本书所作形形色色的，互相矛盾的解釋表示出来了。

例如，巴黎的《实证主义評論》責备我，說我一方面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研究經濟学，另一方面——說說看罢！——又只从事于現有事物的批判分析，而不为将来的食堂，写出調味的处方（孔德主义的嗎？）。关于形而上学云云的責难，西伯尔教授写道：“在所論为真正的理論时，馬克思的方法不外就是整个英国学派常用的演繹法。它的缺点和优点，为一切最优秀的理論經濟学家所共有。”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論家》一文（見1872年7月号8

2 德国庸俗經濟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談家，攻击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关于《資本論》文字上的缺点，任何人也不比我自己更为痛切地感觉到。不过，为了这班大人先生們和他們的讀者們的好处和快意起見，我且在这里引述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俄国人的意見如下。对我的观点完全抱敌对态度的《星期六評論》，关于德文本第1版却說，叙述方法“把一个最枯燥无味的經濟問題也說得有一种特別風味(charm)”。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新聞》也說：“除了少数特別專門的部分，叙述的特色是一般讀者容易理解，明白，并且非常生动，虽說研究的对象需要有高度的科学水平。就这点說，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那些学者用非常晦澀，非常枯燥乏味的語言来写书，以致要把普通人的头砸破。”但是，对讀者們來說，現时德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教授們的著作所砸破的，并不是头。

月号《经济学家杂志》的摘要)中,发现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并且說:“通过这个著作,馬克思先生要算在最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中間了。”德国的評論家說到黑格尔式的詭辯,自然会大肆咆哮。彼得堡《欧洲通信》在一篇专门論述《資本論》方法的論文(見1872年5月号第427—436頁)中,发现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地现实主义的,但叙述方法不幸是德意志式-辯证法的。他說:“驟然按照它的叙述外形来判断,馬克思好像是一位很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并且是德国式的,那就是从坏的方面解釋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是事实上在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上,他比任何一个他的先驅者,都无比地更是现实主义者。……我們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叫作唯心主义者。”对我說来,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評,摘录几段来答复这位作者先生。这种摘录,对那些不能直接閱讀俄文原文的讀者來說,也会有点兴趣的。

这位作者,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柏林1859年版第IV—VII頁)中,引用一段曾經說明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的話之后,往下說:

“对馬克思說来,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各种現象的規律。并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各种現象具有一个完成形式,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間内看到的联系的时候支配着这各种現象的規律。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的,是这各种現象的变化規律,它們的发展規律,那就是由一个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形态,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規律。这种規律一經发现,他就要詳細研究这种規律在社会生活上由以表現的各种結果。……所以,馬克思所殷切关怀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用严格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上某些具有一定性质的秩序的必然